

臧棣:以诗歌捍卫想象的自由



诗人、评论家臧棣

上个月,臧棣《写给儿子的哀歌》(十四首)获第三届钟山文学奖诗歌诗评类作品奖。上星期,他又荣获“2018年度十月诗歌奖”。既是诗人,也是诗歌评论家的臧棣,一直被视为当代诗歌的方向或者说圭臬。臧棣诗歌语言精准、技艺娴熟,他的诗产量很大,同时又维持了极其稳定的水准与质量。

第二届扬子江作家周期间,臧棣接受了现代快报的专访。被问及如何看待“诗歌语言晦涩”这样的评价,他回应道,“我说句不客气的话,目前的诗歌文化中所指认的晦涩的诗,就是读者巨婴症的一种幼稚的反应。”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文 徐洋/摄

01

今年8月,由《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情感教育入门》三本诗集组成的“臧棣诗系”出版。系列诗的写作是臧棣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的尝试,对他而言,是长诗写作的一种变体。

现代文学的诗歌观念中,长诗写作被认为是一位诗人综合创造力的表现,“你文学的理想要通过长诗来实现,可能我心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梦想。”臧棣坦言,在现代的生活节奏中想要用很系统化的方式来写长诗,时间上并不允许,读者也没有精力去阅读,因而,他想用系列诗来取代长诗。

“系列诗,可以形成一种独特的类型长度,从而形成足够的总体意义上的风格力量。”臧棣的系列诗,在结构、连续性、主题方面,不像传统长诗那样依赖同一性和长时间的构思,在系列诗写作中,起主线作用的是诗人看待世界的态度,“诗人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挖掘世界的秘密,从而展现犀利的审美认知。有了诗歌的态度,我们就有机会锤炼出一种诗歌的方法。”

从文学动机而言,系列诗的写作贯穿了臧棣对于日常生活中细微事物和细小体会的关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都偏于对宏大、对历史的关注,但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对节气的观感或者对食物味道的体会,这些在历史的沙漠中都是被忽略不计的。”在臧棣看来,对个人而言,正是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东西与生命息息相关,“对我们生命个体而言,它是非常珍贵、不可替代的。我想怎么样去为这些细小的事物去代言,做一个展现。”

在仅有九行的《芹菜的琴丛书》一诗中,诗人重新擦亮了“芹菜”和“琴”这两个常见的意向,通过它们来重新思索诗歌、生命与死亡:我用芹菜做了/一把琴,它也许是世界上/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样很新鲜。/碧绿的琴弦,镇静如/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但并不缺少线索。/弹奏它时,我确信/你有一双手,不仅我没见过,/死神也没见过。

02

在臧棣看来,诗歌的总体性原则就是“必须创新”。在1987年所写的《詹姆斯·鲍德温死了》中,他就开始使用跨行和句中标点这些当时新颖的技术,“在诗歌的文本结构上、叙事方式上和句法上,我们当代诗人其实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关口上。我们积累的经验更多,可以放下包袱借鉴的东西也更多。所以,更没有理由陷入审美疲劳。”

当然,诗歌的创新不仅表现在诗歌形式上,也表现在诗人的叙事观点上,“新的角度,新的视角,新的词语的组合,只要能呈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表达,都可归入诗的创新之列。”

对臧棣的诗歌,偶尔会有过于晦涩的评价。对此,臧棣认为,优秀的诗歌引发的解读的诗意多重性,本来就是诗的表达所追求的一种东西,诗的难懂与否也和读者的文化素养有很大关系,“而且,我说句不客气的话,目前的诗歌文化中所指认的晦涩的诗,就是读者巨婴症的一种幼稚的反应。”

臧棣是当下诗坛自始至终坚持“纯诗写作”的诗人,他曾说过“诗歌除了高贵,什么也不承担。”这与他坚持诗歌的自足性、自主性,反对将诗歌工具化的观点有关。因此,也有些读者认为他的诗歌远离现实。

实际上,曾经当过一段时间记者的臧棣,问题意识中并不缺少对现实的回应。“我的基本立场是,诗歌的写作应该立足于一种现实感。作为诗人,我们必须对当代现实有着深刻的洞识。我认同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说的一句话:最大的贫乏就是不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中。”他也曾写过雅安地震、北京特大暴雨等现实题材的诗歌,实际上,臧棣对于诗歌与现实有着更深的思考,并不停留在题材表面的相关,“人们常常习惯从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题材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现实性,这很容易作茧自缚。诗歌的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行动。在此过程中,在诗歌的行动中,现实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人们应

该意识到,在诗歌实践中,如何看待现实其实就是如何想象现实。诗歌必须敢于想象现实。”

03

在进入大学之前,臧棣就志于成为一名作家。进入大学以后,受北大诗歌创作氛围的感染,臧棣也开始写诗,并和麦芒、清平、徐永刊印了四人的诗集《大雨》。读研期间,他参与创办同仁诗歌刊物《发现》,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臧棣写下了《在埃德加·斯诺墓前》,并开始“自觉要做一个诗人”。

短暂的记者生涯之后,臧棣于1993年夏天回到北大读博,并留校任教。自此,他开始以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进一步参与中国当代诗的发展。

1996年,臧棣所编的《里尔克诗选》甫一面世,就成为经典,收入其中的《汉语中的里尔克》对里尔克进行了精彩且详细的论述。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他质疑余光中评价戴望舒语言的标准,盛赞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所展现的诗人的心智和诗歌语言的成熟。在《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臧棣将九十年代的写作定性为“转向个人写作的诗歌”。

从臧棣对于诗歌的认识而言,成为一位诗歌评论家,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他陆续发表的诗论于2017年结集为《诗道罅隙》出版。

在臧棣看来,诗歌的产生源于人类对自身“无知”的好奇,诗歌是一种和知识有关的人类实践。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诗歌的能力。放弃这一角度,我们将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诗歌。诗歌的魔力就在于对我们来说它的本质始终是抽象的。”

臧棣是一个稳定且高产的诗人,他每个星期都会写一两首,从不间断。他写诗也不太在意地点和时机,在他看来,“写诗,首先是一种工作。”现在的他,尽可能要求自己规律生活,“我不敢说自己是精力旺盛的人,但我的确相信布封讲的:天才出于勤奋。‘勤奋’是我们身上最富游戏精神的东西。但很可惜,大多数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已陷入人生的疲倦。”

由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如果没有诗歌在我们这个沉闷的世界里坚持捍卫想象的自由。



诗对我们的作用 近乎“天启”

读品:您说“诗,作为一种文学,能神秘地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如何理解?

臧棣:首先,孔子就明确过一个原则:不学诗无以言。这也涉及对诗(《诗经》所代表的言述方式)作为一种文学的作用的肯定。中国的诗歌传统尤其强调诗和生命智慧的关系,所以,在更丰富的生活经历中和诗歌发生关系,就意味着我们主动去接受诗歌本身所蕴含的生命精神对个体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矫正。甚至说“矫正”都有点低调了,诗对我们的作用,近乎“天启”。诗,开启了内在的生命的觉悟。所以,在我看来,怎么强调生命的觉醒和诗的启发之间的关系,都不算过分。如果没有诗歌在我们这个沉闷的世界里坚持捍卫想象的自由,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

读品:身兼诗人和评论家,如何处理理性与感性的关系?

臧棣:其实,无论是从事诗歌写作,还是从事批评工作,都离不开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相互作用。但对创造性的工作而言,比如对现代的诗歌写作而言,思维方式其实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创造性的意识状态的。诗人的工作需要的是一种高度混合的创造性思维状态。就拿评论家的角色而言,一般说来,好像对理性思维的需要更多一点。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批评家的工作,如果没有感性的领悟,对批评对象缺乏直觉的把握,理性思维就变成一块块生硬排列的砖头。所以,只要和文学沾边,和创造性的工作沾边,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激活自己的认知觉悟、认知能力,而不是区分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

读品:您曾经批判过用线性的诗歌历史观来看待中国百年新诗立场,应该使用怎样的“视角”?

臧棣:我其实并不完全反对用线性的方式来解释新诗的发展历史,但必须意识到,这并不是唯一的理解和阐释新诗历史的方式。新诗的起点,在我看来,一直处于一种共时状态。当代诗歌的场域里,同样存在有新诗的起点。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90后诗人,他可以完全不用系统地阅读新诗百年历史的各个阶段的诗人,也能写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诗作。

读品:您认为什么样的读者是“理想的读者”?

臧棣:热爱诗歌。富有同情心。对中外诗歌有过大量阅读的读者。也许,我不太好自诩我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我绝对自信,我是一个“理想的读者”。对诗而言,“理想的读者”,首先愿意接触新的东西,愿意了解新的事物,有点像人们对新大陆怀有的那种天然的热情和好奇心。此外,他也要勇于经常修正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评判尺度。“理想的读者”最好能体现出一种伟大的矛盾;就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阅读博尔赫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心境:既经常阅读他,又很讨厌他。



臧棣

诗人、评论家。1964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有诗集《燕园纪事》《宇宙是扁的》《骑手和豆浆》《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等。曾被评“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2005),“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2007),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度诗人奖,2018年人民文学诗歌奖。



扫码看视频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